

国际区域问题

# 中日 双边互动的战略性思考

吕耀东

**[摘要]** 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与日本外交战略的互动,表现为两国战略分歧与战略对话并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日本“普通国家论”阐释的大国化战略路径相异,导致两国业已存续的冲突与纷争时有显现、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因而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成为发展双边关系的战略选择。寻求中日双边良性互动,要将两国关系置于国际体系的坐标中进行战略定位,在考量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相关因素的基础上,突破既往双边关系的局限性,理性调控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互动及走向。

**[关键词]** 中国;日本;双边互动;相互依存;战略对话;战略互惠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3-7411.2011.01.004

**[文章编号]** 1003-7411(2011)01-0034-(13)

**[收稿日期]** 2010-11-08

**[基金项目]** 第44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日本对外政策调整及中日关系发展前景研究”(200804400145)

**[作者简介]** 吕耀东(1965—),男,山西岢岚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中日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法学博士。(北京 100007)

中日两国的地缘政治处境决定双边频繁互动的历史必然性。对于国家间关系来说,中国和日本作为国际体系内的重要行为体,两国互动及与国际体系环境的互动,这与国际体系形成一种互动与互构的关系。“我们当然不应该认为,国际体系各个组成部分的行为完全由国际体系的性质所决定,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撇开后者去分析前者”。<sup>[1]</sup>将前后两者有机统一起来,就能够从战略高度深入探讨中日双边互动的现状发展及走向。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新兴大国的崛起成为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因素。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基于对当代时代特征的充分认识,是与他国的反应以及与国际社会互动形成的战略定位。中日关系已经从单一的双边关系发展到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也是两国及与当代国际体系环境互动的必然结果。

## 一、中日相互依存与战略冲突并存

众所周知,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从经济的层面讲两国之间互补性强,相互依存日益增强。2002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日本最大的进口来源国。而自2004年以后,按照进出口贸易总额的计算,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到2007年,中国又成为日本产品的最大出口目的地,日中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自此更加紧密。尽管日本依靠对华贸易支撑经济的局面日益明显。但是,一些日本政治家认为

中国国力的增长“已对其实力地位构成现实挑战”，不利于日本“政治大国”目标的实现。显然，中日两国潜在的战略冲突依然存在，同处东亚的中日之间的矛盾具有结构性特征。

对于中国来说，自共和国的成立之初就已成为一个政治大国，但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远远落后于日本，经济方面的国际影响力较弱。两国这样的国情体现了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初期合作的互补性。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日益强大，作为政治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对东亚的辐射能力越来越强，而且在全世界的影响也日益深化。反观日本，二战以来，日本逐渐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但是由于战败的原因和美国对东亚的战略利益，日本一直未能成为一个政治大国。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一些政治家开始以“普通国家论”诠释大国化战略目标。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行为是日本追求政治军事大国的表现，也是对中国国力及国际影响力上升的应对。在“中国威胁论”来看，中国国力的迅速上升、国家影响力不断提高，势必成为日本的战略竞争对手，削弱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甚至构成对日本的战略威胁，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日本积极采取遏制战略措施防范中国，以制约中国的发展。另外，当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形成强烈反差时，日本国内某些保守势力就会以种种借口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形成中日双边关系的摩擦和冲突。对此，有的学者指出：“其实，这恰恰是经历了10年经济萧条的日本人丧失信心的表现。”<sup>[2]</sup>

对于日本某些保守政治势力来说，中日“经济相互依存的方法可能给日本提供一个颇有前途的竞争者，也许还是一个战略竞争者。”<sup>[3]</sup>因此，随着中日相互依存程度的深化，也形成两国的战略竞争的微妙变化，导致双方在政治和安全层面的摩擦时有发生，未来中日关系还有可能会因为双方的结构性矛盾而恶化。正是基于化解这样的“可能性”，中日积极探索两国未来的双边关系的定位，避免因历史、台湾、领土及海洋权益等因素形成的摩擦和冲突，降低中日及亚太地区政治与安全的不稳定风险。

从中日关系的历程来看，邦交正常化后的20年，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与合作成为当时双边关系的主旋律。中日在经贸合作方面继续发展，相互依存不断加深，而且在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卓有成效。冷战结束后的十多年，中日关系出现了邦交正常化的一种复杂局面：在经贸关系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政治关系出现两轮重新定位。与“1995~1996年”短暂的政治低谷不同，小泉上台多次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导致中日政治关系不断“降温”，进而陷入长达5年之久的“政冷”泥潭。<sup>[4]</sup>导致21世纪初期中日关系恶化的局面，看似因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等历史认识问题，事实上深藏背后的台湾问题、钓鱼岛领土主权及东海海洋权益问题、日美安保体制问题等等，形成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造成两国关系不可避免的战略矛盾和冲突。这样的现实存在时时刻刻影响着中日关系的顺利发展。而小泉内阁时期无视中国及周边国家的民族感情，在屡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同时，奉行唯“美”外交政策，恶化亚洲外交，直接导致日本联合国外交失败，使得日本对外关系及对外政策到了不得不全面调整的地步。

中日两国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需要注重“战略性”。这就意味着中日两国应该超越双边关系，相互进行地区及全球性议题的全方位交流与协作。值得关注的是，中日两国之间不仅存在着历史、台湾、领土主权和东海海洋权益纠纷等问题，而且存在非双边层面的利益冲突，中日战略互信仍具“不确定性”。

首先，日本在外交战略上突出援非议题，刻意弱化中非关系。近年来，日本通过主办“非洲开发会议”高调承诺援非举措，化解中国从2000年开始定期召开的有非洲领导人参加的“中非论坛”的影响力。例如，日本作为2008年洞爷湖八国峰会的主席国专门把八国集团和非洲七国的高峰对话安排在首日举行，明确表示对于非洲的援助力度，表示“将把2012年以前的政府开发援助增加一倍，并将提供相应的援助，使民间的直接投资也翻一番”。<sup>[5]</sup>以此弱化中非关系的发展势头。近年来，中国为确保石

油等资源而积极挺进非洲市场,日本则通过增设驻非使馆数量,加大抗衡和压制中国的力度,表现出在非洲外交方面与中国对垒的战略意图。特别是,日本还将“援非合作事项”作为日中战略互惠的重要“一环”,强调要摸索与中国在非洲资源市场上的“合作方式”。日本在削减和停止对华日元贷款的同时,不断增加对非洲 ODA 力度,积极展开与中国的资源外交较量。日本还就所谓“达尔富尔问题”会同欧美责难中非关系。

其次,日本反对八国峰会“扩容”中国。自 2005 年以来,八国集团峰会都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五国共同出席会议,表明八国集团需要中国共同参与和处理国际重大事务。但是,日本在 2008 年主办的洞爷湖八国峰会上,反对八国集团“扩容”中国的态度十分明确。对于法国总统萨科奇曾提议八国集团应把中印等五国吸收进来的主张,有的日本学者表示,“萨科奇总统提出的 G13 构想为时尚早”。<sup>[6]</sup>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也认为,八国集团峰会是“国际政治奥运会”。“日本作为经济大国正在迅速衰落,值得警惕的是中国等“‘金砖四国’的崛起”。<sup>[7]</sup> 对于日本来说,随着中印的迅速崛起,日本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力不断下降,加之“争常”的失败,使日本十分看重在八国集团中的“亚洲唯一代表”的地位和影响力,唯恐因中国的加入被边缘化,因此反对“扩容论”的态度十分明确。日本竭力附和八国集团“峰会成员必须是共同拥有市场经济、民主、人权、价值观的主要国家”的观点,但实际上日本更担心若中国加入,那么日本将失去“亚洲唯一峰会成员”的地位。<sup>[8]</sup> 也使日本预感到“这将对奉行民主和自由价值观的日本外交的一次重大考验”。<sup>[9]</sup> 可见,日本不仅持反对中国加入八国集团的观点,也表明日本对华政策仍然保留“价值观外交”的理念。

再次,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中日两国的环保理念缺乏战略共识。日本在未注重落实《京都议定书》关于 2008 年至 2012 年期间 6% 的减排规定,在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减反增至 8.1% 的情况下,不是将重点放在从根本上加强本国的减排力度上,而是伙同欧盟极力呼吁将中印等发展中国家纳入“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温室气体减排框架之中,敦促中印等国采取“有意义的缓解行动”,完全无视中国自 1990 年以来碳排放量只占世界 9.2% 的事实,刻意利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限制中国未来的发展空间,甚至以此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

近年来,在日本朝野普遍“欢迎日中发展友好关系”的情况下,日本国内一些人只看到两国的利益冲突,而无视中日两国合作共赢的成果及前景。包括日本执政党内仍然存在着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误读,不能正确处理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常常急功近利,忽视彼此“共同战略利益”,表现出有损中日关系的言行。对此,自民党元老伊吹文明无不忧虑地说,“如果两国不能携手合作,那恐怕将对世界和人类造成消极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落实和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绝非坦途。

随着中日两国“战略性互惠关系”的确立,通过战略对话寻求“共同战略利益”初见成效。关于“战略性”一词,日本原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认为,它涵盖一个“具有综合性”、“从大局出发的”、“具有长期性”的意义。“不要把像今天这样具有广泛合作领域的两国关系看作是政治、防务、贸易、投资或环境。能源问题来单项分别考虑,而应该将其相互联系在一起进行综合性地考虑。再有,我们不要只顾眼前所发生的事情,要从大局出发、从战略角度来处理日中两国关系”。<sup>①</sup>

2008 年 5 月 7 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东京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为两国关系未来确定了发展方向。该联合声明第一条确认:“双方一致认为,中日关系对两国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肩负着庄严责任。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的唯一选择。双方决心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可以说,随着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日

① 引自日本国前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35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题为《二十一世纪的东亚与日中关系——从对立敌对走向对话·共存·合作》的发言稿。

益扩大, 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将会保持着良好沟通与协调, 进一步体现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和内涵。

## 二、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动因及取向

冷战后以来, 日本对华战略体现为: 第一, 日本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目的之一是借重美国的力量来增强与中国对话的讨价还价能力; 第二, 日本谋求对华直接施加影响; 第三, 日本从均势论的观点出发, 谋求通过发展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来抵消中国的国际影响力。<sup>[10]</sup> 进入 21 世纪以来, 日本既期望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受益, 又担心中国与其争夺地区主导权, 认为中国未来有可能在军事上对日构成威胁。因而日本对华战略具有“不确定性”。日本这样的对华矛盾心态, 导致日本对华政策保持两手准备。

尤其是 21 世纪的中日关系的调整已经表现在双边与多边关系之中。首先, 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 日本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强项, 积极寻求掌握东亚经济共同体的主导权, 与中国经济领域抢夺制高点, 掌握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另一方面, 日本力图通过“扩大的东亚一体化”, 引导共同体政治进程, 借助与日本的所谓“同质性”国家来抗衡中国。日本在不同场合提出要以“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作为东亚合作的基础, 试图以“价值观”、“制度”等政治“构件”, 与中国争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导权, 谋求通过发展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来抵消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本这样的战略意图表明, 日本对华政策理念尚且缺乏正确的平衡心态和理性的战略思维。其次, 通过日美同盟遏制中国。2005 年 2 月的“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2+2会议)”后发表共同声明, 确定了 12 项关于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 首次将所谓“鼓励和平解决有关台湾海峡的问题”列为日美共同战略目标之一, 大有插手台海事务的意图。

2009 年 5 月 1 日召开的“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2+2会议)”会议上, 进一步强调“针对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提高的中国, 双方在敦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际利益相关者’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 也要求其提高军事透明度”。日美以强化同盟关系遏制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sup>[11]</sup> 这不仅无助于维护持久稳定的中日关系, 也对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及区域合作进程产生负面影响。以上战略意图表明, 日本对华政策理念尚且缺乏正确的平衡心态和理性的战略思维。

可以说, 日本国家利益的确立和追求, 决定其对华政策的摇摆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日本的决策者对华政策理念仍然具有或然性: 既期望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受益, 又担心中国与其争夺地区主导权。这就导致日本对华战略的不确定性, 显示出对华政策的两手准备。

其一, 在安倍当政期间, 对内修改《教育基本法》加速修宪步伐, 谋求早日突破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禁区。在外交上采取的“价值观外交”, 表现出安倍政权外交理念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使其在对华政策方面的成效大打折扣, 给中日关系带来不和谐音。安倍对华“两面下注”的战略意图, 不仅无助于改善中日关系, 势必对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及经济一体化进程也会产生消极和负面影响。特别是, 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强调发展中日“友好”关系, 只是获得利益的手段而已。这已经明确表达了日本对华战略调整的核心内涵和本质。

其二, 基于小泉当政期间亚洲外交失败的教训, 为了改变小泉日中关系的“经热政冷”局面, 安倍内阁积极倡导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这样的对华战略理念, 在福田内阁时期的对华政策得到进一步实施和完善。福田出任首相后明确表示, 要继续推动日中战略对话与合作, 巩固和加深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并回避安倍内阁时期提出的“价值观外交”、“自由与繁荣之弧”等被视为“围堵中国”的外交理念, 与中国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的“第四个政治文件”, 维护和巩固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为发展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创造有利条件。

在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形成前夕,由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日益增强,日本国内研究国际政治和日中关系的一些专家就未来的日中关系发表了《日本对华综合战略》建议书。该书由 IIR 综合研究所的“日本的对华综合战略研究会”撰写。该研究会预测 2020 年前后的中国发展前景称,中国最可能成为一个“不成熟的大国”,即虽然有着“众多国内矛盾和社会问题,但仍然保持经济增长,走上成为世界政治及经济大国的道路”。在此基础上,研究会提出了 16 项建议。这些建议包括:举行日美中三国首脑会议并使之成为惯例;提高日本的对外信息传播能力;积极推行重视质量的留学生政策;积极促进有助于日中双向理解的近代史研究;积极吸引中国资本和游客等等。该研究所还定期举行相关报告会。研究会成员之一的京都大学教授中西宽分析指出,“自 1990 年代至 21 世纪,日中关系的战略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又使得历史认识问题政治化,加深了双方的对立意识。但是,现实生活中两国相互依存程度加深,在此基础上双方踏出了迈向战略互惠关系的一步”。他还强调,中日两国关系在应对民族主义情绪时还非常脆弱,指出牢固的双边关系并不能仅仅建立在对双方均有利的“互惠”认识之上,还必须依靠包括社会和文化层面在内的相互了解,“对日中两国而言,后者还相当脆弱。特别是在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方面,基本结构几乎没有变化”。<sup>[12]</sup> 他呼吁加强中日两国“基于战略性利益的互惠关系”。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机遇,日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中国愿为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作出贡献,日方对此表示支持”。这样的表述说明日本的决策者已经认识到:对华“两面下注”的战略意图,不仅无助于改善中日关系,还势必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及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消极和负面影响。

日本战略天平已经从“中国威胁论”倾向于“战略互惠论”。“战略互惠论”是“中国机遇论”的进一步发展,意思是指中日应超越双边、着眼长远的合作与互惠。这体现了日本决策者理性务实的一面,为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与双边合作的深化带来了新的契机。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日方确认:“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机遇,日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中国愿为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作出贡献,日方对此表示支持”。<sup>[13]</sup>

日本民主党新政权的自主外交政策及特点是:加强发展与中韩等亚洲的关系,注重“日美同盟”与“亚洲外交”的平衡关系,以“外交三原则”回归的“外压力”,实现“日美同盟关系”的对等化。日本的目的不是在重视亚洲与日美同盟两者中的选择,而是力求在两者的平衡中掌握东亚共同体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因此,民主党上台,中日关系机遇与挑战并存:日本民主党长期以来与中国保持交往;在自民党时期,中日关系已有较好的发展基础,民主党将继续为中日关系充实内容;在中日关系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民主党立场比较明确;从大战略格局上看,日本战后第一次处于不受任何大国牵制而可以自主发展同中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机遇期;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和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但是民主党上台并不意味着中日之间的矛盾问题会迎刃而解,例如中日民间感情,涉藏、涉台、涉疆等问题,还有中日两国之间的领土与资源纠葛等。日本新政权对华政策的变与不变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在坚持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连续性上,民主党新政权表示将继续坚持中日两国既定的“第四个政治文件”,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且在双边场合确认了日中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性,强调进一步加强两国合作的必要性。民主党对于中日两国此前确立和推进的战略互惠关系表示:日本政府愿与中国政府一道,继续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谋求充实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sup>[14]</sup> 并认为,承认相互差异并相互尊重的“友爱”精神与 1972 年《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也是一致的。日中两国在所有领域推进合作时,应表现出承认相互差异和相互尊重的姿态。只有这样才能将日中关系发展到新的高度。

第二,在关于历史认识问题上,民主党新政权表现出不同以往的姿态。一是明确表示执政后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并将落实民主党提出的新建不带宗教性质的国立追悼设施的主张,对新建国立追悼设施持积极立场。这将减少中日两国在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的摩擦。二是鸠山首相在纽约首次与胡锦涛会谈中表示,日本新政府将基本沿袭对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表示道歉的“村山谈话”,但是强调“能够超越双方立场差异的外交、能够认同相互差异的关系是‘友爱’”的观点,表明日本对于历史等问题的理解始终保留自我的认识。日本外相冈田克也曾提议日中韩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表明日本新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新思路。

第三,关于构建东亚共同体与发展对华关系的理念。民主党表示要与中国等亚洲各国建立信赖关系,致力于构建东亚共同体。并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高调宣扬东亚共同体构想,强调东盟和日中韩三国的核心作用。鸠山前首相在北京第二届中日韩首脑会议等场合对此构想加以确认,显示出比以往自民党联合政权更强的政策力度。当然,鸠山也表示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共同体”也在考虑范围内。民主党关于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与日美同盟相并重的立场,是鸠山内阁外交政策的两大支柱,其目的是希望通过与中韩的合作关系提升日美的对等关系,并通过同盟内部整合,抗衡日益崛起的中国,保持日本在亚洲的影响力。

第四,在台湾问题上,民主党在《政策公约》中主张“推进与台湾基于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仍顽固坚持基于“在2005年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到的被作为日美共同战略目标的台湾问题”的立场。并进一步表示,“民主党在不支持台独的同时坚决反对中国对台湾付诸武力。在以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为前提,将开展预防性工作作为缓和两岸局势的手段,并将其归为最重要课题之一”。<sup>[15]</sup>这也就是说,民主党与自民党执政时期的对台政策并无实质差异。鉴于“台独”分子访日、民主党部分亲台议员的现实存在,“台湾问题”或将可能成为有损中日关系的政治诱因。

第五,民主党《政策公约》明确表示“日中两国间存在着食品安全、人权、环境、能源、军事透明度及东海油田开发等悬而未决的问题”。<sup>[15]</sup>首先,关于涉藏、涉疆方面,尽管鸠山内阁成员未与窜访日本的达赖喇嘛和“世维会”主席热比娅会面,但日后民主党内仍有人可能以“自由、人权、民主”的借口,在涉藏、涉疆等问题上对中国内政说三道四。其次,在对华环境外交方面,日本民主党在《政策公约》中提出了要在防止全球气候变暖和二氧化碳减排方面掌握主导权。并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作为针对性目标,企望开展环境外交攻势,占领全球环境问题上的道义制高点。鸠山前首相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宣布了“鸠山倡议”,提出“力争到2020年日本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削减25%”的中期目标。他强调,为了“确保实效性”,新的全球气候变暖对策的国际框架需要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参与,并将敦促中美及印度参加。这样既能够就“减排问题”向中国施压,又可以达到日本环保经济赢利的目的。再次,涉及东海和钓鱼岛等问题,民主党联合政权完全继承和延续了自民党执政时期的强硬政策。另外,在所谓中国军费透明度问题上,日本借奥巴马总统提出消除核武的全球呼吁频频对华施压。

近年来,中日国力对比和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赶超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的国际舆论下,中日战略对话与战略分歧同在,日本对华关系存在着一定变数。鉴于日本民主党主张中日既定的、以追求共同利益为目标战略互惠关系将继续发展的态度,两国通过战略对话,处理分歧,建立政治互信,将成为日后中日关系发展的方向。

迄今为止,执政的民主党对华外交在态度上比自民党更为明确。日本政权更迭后的对华政策有所调整,尽管表明日本仍继续发展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但是,执政的民主党关于建立所谓“与中国等亚洲各国建立信赖关系”的态度尚需观察。日本民主党参议院选举落败后的外交政策缺乏战略性。

一方面,民主党未能实现执政之初的外交战略目标,在对美国“对等化外交”受挫后,随即放弃“平

衡外交”,忽视东亚共同体建设,调整亚洲外交重点,采取亲韩疏华的策略,凸显民主党外交政策的短视及非战略性。另一方面,未能把环境、气候、能源等全球性民生问题作为其参与或主导国际事务作为切入点,表现出缺乏把握战略制高点、引领全球性议题的外交能力。未来10年,日本决策者对华政策理念仍然具有或然性:既期望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受益,又担心中国与其争夺地区主导权。这将导致日本对华战略的不确定性,显示出对华政策时有反复的可能。

### 三、中国对日政策调整的战略考量

中国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贯彻和平发展战略。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因而一直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作为外交战略目标。从中国对日战略调整来看,处理好中日睦邻关系有益于我国“国内发展”,有利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反之,则不利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落实。因此,在中日双边互动定向和评价基础上,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坚持“和平发展战略”,积极调控双边政策互动,使中日相互依存关系向友好合作的方向发展至关重要。

中日两国潜在战略冲突的存在,凸显彼此增信释疑的重要性。在2008年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形成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举行的第四次中日舆论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关于日本的未来走向,当问及“有人担心21世纪日本会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也有人认为日本会继续走和平主义道路。你的看法如何?”有35.0%的被调查者认为日本会继续走和平主义道路,有25.0%的人选择了“走军国主义道路”。另外有34.8%和5.2%的人分别选择了“不清楚、不回答”和“其他”。从选择“不清楚、不回答”的比率之高来看,还有很多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未来走向“说不准,拿不稳”,持观望态度。<sup>[16] (21)</sup>但是,选择未来日本“会继续走和平主义道路”的比例略高于选择“走军国主义道路”的,说明很多国民对于日本未来走向仍有疑虑。可见,从双方大局出发,逐步消除误解,共创友好互信、合作双赢的和谐氛围,推动中日关系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关键要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和《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也就是说,中日两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签署的“四个政治文件”的基本内容,是维护和巩固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充分表明中方发展中日关系的全新理念,明确表示:“日本在战后60多年来,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通过和平手段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双方同意就联合国改革问题加强对话与沟通,努力增加共识。中方表示重视日本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愿意看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sup>[17]</sup>尤其是,“我们对战后日本走和平道路及其对中国和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进行积极评价就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也体现了战略互惠关系”。<sup>[16] (32)</sup>

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即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这两个方面是既有区别而又相互关联的。从对日战略来看,处理好在中日睦邻关系有益于中国“国内发展”,有利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反之,则不利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落实。近年来,日本国家对外战略明确表现为:企图通过修改“和平宪法”加快“普通国家化”进程,不断强化日美同盟,扩大海外派兵,营造“价值观联盟”,频繁与邻国制造能源、领土及主权权利上的纠纷和摩擦,并波及和影响未来东北亚乃至亚太的政治及安全环境。与日本相反,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抛弃了历史上大国武力崛起的旧道路,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也是对中国和平发展理论的创新。

中国外交将新安全观付诸实践,积极构建周边区域安全合作制度框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亚洲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一般来讲,在双边战略互动过程中,一国对外政策的变动可能引起另一国的“敏感性”反应,同时,双方长期形成的“矛盾”和“误解”,只能在双边良性互动过程中得以化解。因此,在中日双边互动定向和评价基础上,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坚持“和平发展战略”,积极调控

双边战略性互动,使中日相互依存关系向友好合作的方向发展至关重要。

目前,中日“战略互惠”共识成为构筑新世纪中日关系的新起点。日方也表示中国经济发展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强调构筑日中“互惠”关系的重要性。可以说,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共识是中日相互依存的必然,中日双边战略互动将不断强化两国相互依存的深度。然而,在小泉执政时期,日本在历史、领土及东海海洋权益等“敏感性”问题上的错误言行,严重违背了中日三个政治文件的承诺和规范,导致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使两国政治关系降至冰点,无法“顺应”区域一体化的国际趋势。所以,在中日双边互动过程中,应该积极引导日方进行角色的“换位思考”,从他国的角度来解释本国的战略意向,并以此为根据来指导本国的言行。应该积极强调中日相互依存的“互补性”和两国合作的“互惠性”,进一步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思想,化解日本关于“中国威胁论”的消极影响。通过中日双边战略互动,推动日本调整 and 修正对华战略,促进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中日双方视两国关系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双方就必须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正确处理好历史、台湾、领土及东海问题,通过战略对话,平等协商,处理分歧;继续加强双方在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加强民间友好往来,共同开拓中日友好合作、互利双赢的新时代。

目前,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中日关系已进入新的战略共识形成时期。这样的说法是基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确定和发展。2008年5月7日,胡锦涛主席和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东京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提出,“双方一致认为,中日关系对两国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双方决心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既然它是双边签署的协议,那么首先它是一种在彼此“利益交叉点”上的共识;而且,在声明中将其提到了一定“战略”高度,正是如此,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战略共识”。需要明确的是,当前只能说这种共识处在“形成”期。之所以说处在“共识”形成的阶段,在于两国之间仍需增进政治互信,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国民友好感情,加强互利合作。“我们对日本未来的走向还不能准确地把握,但我们可以通过双边或多边战略利益的互惠与互动,引导日本向着有利于中日两国以及亚洲各国利益的方向发展”。<sup>[18]</sup>

总之,“战略互惠关系”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与日本国际战略之间的“利益交叉点”,是中日“求同存异”的结果,是中国“和谐世界”理念的表现形式,是中日双方“共同利益”的具体体现。

#### 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态势

2008年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表明:“双方确认,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双方重申,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双方确信,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和日本将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巨大机遇和利益”。<sup>[19]</sup>中日“战略互惠”共识成为构筑未来中日关系的新起点。从2006年与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举行的两次中日舆论民意调查结果比较显示,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在“你对中日关系的前景持何看法”的答案当中,持“乐观”态度的被调查者占总数的9.4%,增加2.8个百分点;“比较乐观”者为40.3%(2006年调查此选项为“谨慎乐观”,2008年为“比较乐观”),降低了6.6个百分点;“保持现状”者为28.6%,增加了11.8个百分点;“比较悲观”和“悲观”者分别降低了7.1个和2.8个百分点;“不清楚、不回答”增加1.8个百分点。虽然“比较乐观”的比率比上次调查有所下降,但从“乐观”、“保持现状”的上升幅度和“比较悲观”和“悲观”的下降幅度看,中国民众对于中日关系的前景总体上是乐观的。<sup>[16] (16)</sup>

随着中日相互依存程度的深化,“继往开来”将成为中日两国双边互动的总体向度。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共识是中日相互依存的必然,中日双边的战略性互动,将是未来中日两国不断强化战略互惠关系的大方向。

当然,日方表示中国经济发展不是“威胁”而是“机遇”,突出强调构筑日中“互惠”关系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日方看待未来中日关系大有重视“互惠”、轻视“战略性”的倾向。这样不利于“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因为互惠意味着以怨报怨、投桃报李,其道德地位是模糊的。它有可能导致带来相互伤害的冲突,其政治价值也是有问题的。如果处于特定互惠情境的双方以有害行动为起点,如果双方一直保持这样的战略,则合作永远不能达成”。“即使存在共享利益,关于对等的判断不受扭曲,互惠战略也会导入死胡同”。<sup>[20]</sup>尤其是,中日双边的“战略性”互动,不仅受国际环境的影响,更受两国历史、文化、思想、社会制度、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等因素的制约,因而两国双边互动可能出现合作、竞争、冲突、顺应等形式。其中,合作是为达到“互惠”的共同目的,彼此相互协调、配合的最佳战略互动方式。随着中日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强化,实现“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是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理想模式。但仅有理想的目标是不够的,为了避免过去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还需要有完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信念与行为配合。<sup>[21]</sup>所以,在未来中日双边战略互动过程中,中国将突出强调中日相互依存的“互补性”和两国合作的“战略性”,进一步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思想,推动日本从战略高度理解中日的“互惠性”,通过中日双边战略性互动,促进日本调整和修正对华战略误读,促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良性发展。

不可否认,中日战略共识与战略分歧同在,未来中日关系走向具有以下几种可能性:一是保持上升态势。将遵循《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的各项共识,相互支持、推动两国的和平发展事业,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未来。二是中日两国关系平稳发展。中日两国在某些治理全球性问题方面逐步达成战略共识。在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认同关于按国家分别制定温室气体削减目标。中国对日本提出的“按行业设定减排目标机制”表示理解,乐见日本未来继续发挥国际环保积极作用。三是中日关系出现反复与回潮。展望未来,可能会因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恶化两国关系,并对于亚太地区、国际社会的繁荣和稳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总体上来讲,中日依然表明将坚持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从目前局面看,中日双边互动已进入“战略互惠”时期,要以此不断深化在国际、地区和双边等各领域的对话、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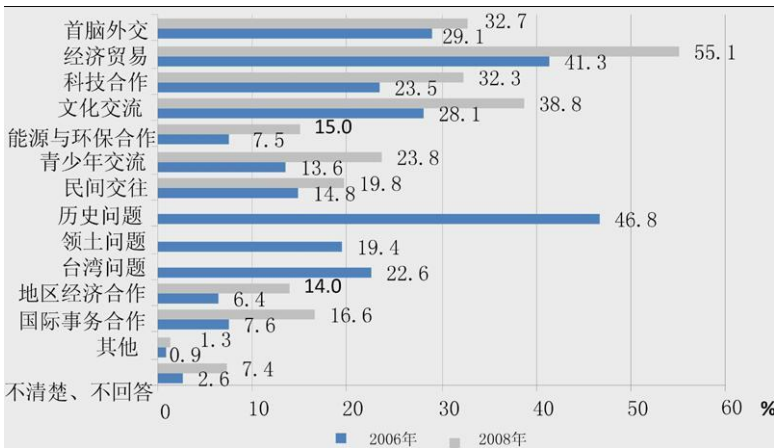


图 2008年与 2006年中国民众认为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问题调查结果比较

在 2006~2008年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形成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2006~2008年的两次中日舆论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 2008年度调查中,关于发展中日关系需要重视的问题,在问及“为使中日关系在 21 世纪健康稳定发展,你认为以下哪些方面最重要?”,有 55.1%的被调查者选择了“经济贸易”,比 2006 年调查增加 13.8 个百分点;认为“文化交流”重要者为 38.8%,增加了 10.1 个百分点;选择“青少年交流”者为 23.8%,增加了 10.2 个百分点;“科技合作”、“国际事务合作”的比率也都分别增加近 10 个百分点,其他答案的比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2006年被调查者对于发展中日关系需要重视的问题依次为:“历史问题”、“经济贸易”、“首脑外交”、“文化交流”、“科技合作”;2008年被调查者关注的前五位顺序为:“经济贸易”、“文化交流”、“首脑外交”、“科技合作”、“青少年交流”。两次舆论调查结果的位次比较,除了引起中日两国高度重视的“历史问题”和“青少年交流”之外,其他四项都在前五位之内,这说明,中国民众眼里发展中日关系需要重视的问题这两年没有变化。<sup>[16][17]</sup>同时,台湾、领土及东海问题也被民众纳入关注重点。这也表明了中国民众对于未来发展中日关系具体内涵的充分把握,其基本上与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有关推动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内容相吻合。

首先,积极推动实现“低碳社会”的目标,推动环境领域的全球性合作,顺应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趋势的战略意向,也成为进一步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利益共同点”。中国主张要与世界各国在“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积极倡导日本等发达国家要从技术合作与转让、援助和投资等方面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促使发达国家认识到,运用本国的环保先进技术,在促进世界各国环境技术合作,解决相关的环保技术合作与技术转让问题上,帮助发展中国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是其今后环境外交的最佳选择。中国可以借助日本主办的“亚太环境会议”的对话平台,加强与日本的环保战略对话,积极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不断深化。通过中日两国环境保护合作的拓展,“共同致力于振兴亚洲及应对全球性挑战”。可以说,中日经贸关系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两国在节能环保领域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今后还应在金融和高新技术领域开展合作,使经济合作向质的方向转变、发展。

其次,中日两国需要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协作。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的军事冲突和对峙的烈度有所缓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而且,各国在对待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态度上由开始的相互指责走向合作。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里,合作逐渐取代竞争和对抗,成为东亚地区国家关系的新动向。近年来,中日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对话,无疑给东亚的地区性制度建设和地区认同的加强注入了新的活力。中日及东亚地区有关国家尽管在传统安全领域存在难以一时走出的“安全困境”,但加强在经济、金融、缉毒、反恐、反跨国犯罪、抗击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领域里的合作却成为大多数国家间的共识。特别是,四川汶川大地震后日方派出了救援队和医疗队,引起了中方积极反响。有鉴于2008年中国四川发生大地震以及缅甸遭遇强热带风暴,福田倡导构建“亚洲防灾防疫网”等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旨在将亚洲各国紧急救援组织连为一体,共同应对地震、海啸等大规模灾害和禽流感等突发事件。这一战略理念符合目前东亚地区性非传统安全问题频繁发生的现实。近年来,中日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协作,无疑给东亚的地区性应急机制建设和地区认同的加强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全球化时代,非传统安全具有跨国性和传播性,各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通常不是别国造成的,更多来自非国家行为体或大自然。同样,中日两国也难以独善其身,只有通过合作,才有可能减轻或消除威胁,取得“共赢”、“互惠”的结果。

第三,构建东亚地区磋商和合作机制,应该是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应有之义。构建和谐世界,建设和谐周边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就可能有害于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甚至危及其国家利益。比如,小泉执政时期的日本对外政策,一味强化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外交理念,处处“与邻为壑”,与周边国家严重“失和”,导致日本的“争常”失利。这样的教训是深刻的,因而,争取建立睦邻的磋商与合作机制应该是中日两国建设和谐周边的主要内容之一。近年来,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日两国积极参与APEC、中日韩+东盟、东亚峰会等磋商和合作机制的构建,正在逐步化解东亚区域内长期以来中日两国的一些猜疑和误解。但构建东亚地区磋商和合作机制尚需“磨合”。中日及东亚各国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发展模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各不相同。这种多元并存的客观存在,要求东亚各国在多边交往中学会协商对话、彼此尊重的同时,确立新的地缘认知理念,形成以非对抗方式处理彼此矛

盾的良性政策互动。另外,尽管中日及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大多以东方文化、传统历史等为根本的共同点,为东亚经济一体化提供诸多的“和谐”因素。因而,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理念,本着“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开放包容、面向世界”的原则,积极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积极进行战略对话,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协调与合作,遵守相关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共同努力推进东亚合作机制的新进展。

第四,中日怎样解决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战略定位,如何从战略高度化解中日关系中出现的一些“难点”问题,对于维护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正如胡锦涛主席2008年5月访日时强调的那样,中日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进一步发展的新机遇,双方应共同努力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因此,在中日双边互动定向和评价基础上,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坚持“和平发展战略”,积极调控双边互动,使中日相互依存关系向友好合作的方向发展至关重要。目前,中日双方也一致认为,发展中日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促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是时代赋予两国的历史使命。在国际体系范畴中,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两国都对亚洲及世界繁荣负有责任,在完成这一使命的过程中扩大双方共同利益是战略互惠的核心。为了强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前任中国驻日大使崔天凯曾强调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础是相互信任,双方应对彼此的发展道路、战略意图、外交及国防政策持有正确认识。具体而言,是否所有的日本人都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开发导弹防御系统的目的何在?中方对此持有疑虑,希望通过交流与对话解决。二是战略互惠的重点是相互尊重彼此的重大关切。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就属于这一范畴。同时,东海油气田问题对双方都是敏感问题,希望通过平等协商进行合作以取得双赢的结果。三是战略互惠关系的动力是扩大共同利益。日本在节能环保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与技术力量,中日两国在这一方面可以开展互惠合作。在六方会谈和东北亚安全保障问题上,双方也可以通过合作分享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四是战略互惠需要高效的机制。两国如果能在政府、议会、媒体和国民等方面建立起全面交流的机制,就可支持战略互惠关系。五是“希望我们两国能够共同努力,充实战略互惠,增进战略互信,能够真正成为战略伙伴”。<sup>[22]</sup>“共同利益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齐心合力扩大共同利益是发展日中关系的关键之一。

崔天凯前大使还主张要在国际格局变化的大背景下审视日中关系。他认为,中日两国的发展引起了亚洲的变化,而两国亦受到这一变化的影响;两国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消除贫困等人类共同面临的课题前负有一定责任,“国际社会对我们抱有期望”。他强调看清大局、不被具体的困难或问题挡住视线是两国的利益所在,也是两国对亚洲乃至世界的责任。<sup>[23]</sup>这样的观点充分突出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战略性”,指明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方向。

当然,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互动并非完全是良性的。在日本一些保守势力只看到两国的利益冲突,包括日本执政党内仍然存在着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误读。参议院选举落败后的民主党部分政要开始发难中国,凸显钓鱼岛领土主权与东海海洋权益等问题依然是困扰中日两国关系的现实症结。尽管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中日两国围绕经济合作等话题开展的政府间务实交流日益加速。并起用经济界重要人士丹羽宇一郎出任驻华大使,加强对华经济外交。但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民主党部分政要完全继承和延续了自民党执政时期的强硬政策。并在所谓“中国军费透明度”及钓鱼岛领土主权和东海海洋权益问题方面,借美国全球战略东移亚太,美韩东北亚军事演习频频对华施压、升级。

2010年9月7日上午,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中国钓鱼岛附近海域非法纠缠中国“闽晋渔5179”号渔船时发生碰撞,随后,日方巡逻船对中方渔船实施非法拦截,并非法扣留中方渔船及渔民。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7日夜间决定,以“涉嫌妨碍执行公务”为由,逮捕中国渔船船长,

同时还以涉嫌违反日本《渔业法》(逃避登船检查)为由展开调查。日本政府高官 7 日晚间表示, 将把中方船长“带到最近的检察机关或是警察机构, 按照日本的程序加以处理”。

针对上述事件, 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强调,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领土, 要求日本巡逻船不得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所谓“执法”活动, 更不得采取任何危及中国渔船及人员安全的行为。但是, 近来日本部分政要不顾中日关系大局, 就“9·7 钓鱼岛事件”大做文章, 继续扩大势态, 利用日美同盟关系拉拢美国介入“9·7 钓鱼岛事件”, 竭力扩大日美安保机制的适用范围。并以日本国会预算委员部分议员观看“9·7 钓鱼岛事件”录像, 寻求所谓“执法”活动的合法性。正如 2010 年 11 月 1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言, 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在钓鱼岛海域对中方渔船进行干扰、驱赶、拦截、围堵和抓扣, 本身就是非法的, 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中国渔民的正当权利。<sup>[24]</sup>也就是说, 日本在“9·7 钓鱼岛事件”中的“非法性”行为不容置疑! 日本部分政要本末倒置、混淆国际视听的伎俩只会导致“以邻为壑”的恶果。

日本民主党政府以“9·7 钓鱼岛事件”转移冲绳“民怨”的注意力, 制造新的“中国威胁论”强化日美同盟关系, 凸显民主党部分政要的对华政策取向。可以说, 日本与中国、韩国、朝鲜和俄罗斯关系中的症结并未根除, 问题依然存在, 矛盾时而彰显。民主党执政之初提出的解决日俄“北方四岛问题”与“东亚共同体”构想前景渺茫。民主党参议院选举落败后, 其外交政策调整不仅没有缓和原有的矛盾, 反而大有恶化周边关系的趋向。日本部分政要正在借助深化日美同盟之机, 通过与邻国不断制造摩擦的形式, 力图摆脱“战后体制”, 恢复因二战侵略他国“丧失”的部分国家对外职能, 一步步接近其“普通国家论”所诠释的大国化战略目标。鉴于日本民主党主张继续发展中日既定的、以追求共同利益为目标的战略互惠关系的姿态, 希望日方及时改弦更张, 维护中日关系大局。

总之, 中日关系不稳定, 东亚不可能稳定, 化解这一挑战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是要实现中日关系的历史性和解, 并形成相互兼容的战略关系的未来。<sup>[25]</sup> 战略行为主要表现为行为体在行为上和言语上的互动,<sup>[26]</sup> 因而需要二者的真正统一。我们相信中日两国有足够的智慧和动力, 促使双边关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飞跃”。中日双方均视两国关系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推进中日发展战略互惠关系, 就是要不断扩大战略共识, 在共同战略利益领域加强合作, 增强抵御政治摩擦的能力, 减少互不信任和战略性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双方只有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才能开拓中日战略互惠的新时代。

## 参考文献

- [ 1 ] [美] 斯坦利·霍夫曼.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216
- [ 2 ] 关志雄. 中国经济新论. [ M]. 东京: 日本侨报社 2004 7.
- [ 3 ] 杜浩. 冷战后中日安全关系[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13
- [ 4 ] 秦治来. 战略互惠引领下的中日关系[ N]. 学习时报, 2007—10—11.
- [ 5 ] 日本共同社. 2008—07—09 电.
- [ 6 ] [日] 平林博. 首脳外交力で「洞爺湖」を成功させよう[ J]. [日] 自由民主, 2008 (7): 63
- [ 7 ] 产经新闻, 2008—07—03
- [ 8 ] 东京新闻, 2008—07—07.
- [ 9 ] 产经新闻, 2008—07—08
- [ 10 ] 刘世龙. 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 J]. 日本学刊, 2003 (5).
- [ 11 ] 吴怀忠. 从《防卫白皮书》看日本对华安全政策[ J]. 东北亚论坛, 2009 (1).
- [ 12 ] 日本共同社. 2008—07—15 电.
- [ 13 ] 日本驻华大使馆网页: <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j-080507-2.htm/>
- [ 14 ] 日本共同社 2009—11—14 电.

[ 15] 日本民主党, <http://www.dpj.or.jp/policy/manifesto/seisaku2009/08.html>.

[ 16] 王伟. 第四次中日舆论调查报告——培育中日两国民众亲近感任重道远[ J]. 日本学刊, 2009(2): 16-17, 21-32.

[ 17] 中国政府网, <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j-080507-2.htm>.

[ 18] 王屏. 中日相互认识的历史维度[ J]. 日本学刊, 2007(2).

[ 19] <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j-080507-2.htm>.

[ 20] 〔美〕罗伯特·基欧汉. 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14—115.

[ 21] 张蕴岭. 构建和谐世界: 理论与实践[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179.

[ 22] 日本共同社, 2007—11—04电.

[ 23] 日本共同社, 2009—03—06电.

[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ttp://www.mprc.gov.cn/chn/gxly/tb/lyby/765689.htm>.

[ 25] 朱峰. 国际关系理论与东亚安全[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547.

[ 26] 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J]. Vol. 88 No. 2( Jun 1994), pp. 396.

〔责任编辑 富燕妮 许 佳〕

Strategic Contemplation on Sino— Japan Bilateral Interaction

LY Yao— dong

Abstract: China's Idea of Harmonious World and Japan's foreign strategy are interacting, which leads to the state of both conflict and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o put it concretely, China is sticking by the road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Japan is seeking to become a Normal Nation. Therefore, building reciprocal relations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s is the only strategic choice for developing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get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Sino— Japan relations should be strategically located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system. China and Japan should break out the limit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the history and rationally control the intera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rategic reciprocal relations after a scrutiny of the relative factors of Sino— Japan strategic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Key Words: China; Japan; bilateral interaction; inter— dependence; strategic dialogue; strategic reciprocal relationship